

19世紀葡萄牙天主教在華遺留財產 與俄羅斯東正教駐北京使團

柳若梅*

19世紀下半葉，歐洲在華天主教經過18世紀耶穌會解散和滿清政府自雍正年間起近百年的禁教政策，昔日風光早已不在，到19世紀20年代，在京的歐洲天主教傳教士只有住在南堂的畢學源（Gaetano Pires Pereira, 1763-1838年）、李拱宸（José Ribeiro Nunes, 1767-1826年）和住在北堂的高守謙（Veríssimo Monteiro da Serra, 1852年去世於葡萄牙）、福文高（Domingos Joaquim Ferreira, 1758-1824年）二人，在朝司欽天監正副之職，兼理算學館事務，中國籍薛姓神父在北堂助四人理教務。西堂被官府拆毀，東堂失火後被籍沒。1824年（道光四年）福文高去世。高守謙急欲廣招法國會友來京助理，乃設一計，特上奏疏，托言生母年邁，理宜西歸終養，並薦他國修士代理曆務。疏上皇上惟准其歸養，不允他人代理曆務。高守謙言已出口，勢難挽回，於1826年回國。1827年，皇上降旨令籍沒北堂。李拱宸1826年去世。至此在京歐洲傳教士只年屆六十有餘的畢學源一人。畢學源恐身後南堂遭籍沒，“預將其堂之地契文約，俱托俄國教士魏姓收存。畢學源卒後，該教士向內務府追變“，”索遺業，皇上複降諭旨，令將南堂歸還俄國教士魏姓收領……此外尚有滕公柵欄、與正福寺之墳塋園圍及南堂之西洋書庫，亦俱賴俄教士照管，不至荒廢損失。至咸豐十年……降生後1860年，中國與西洋各國議和，魏教士接位之人將畢學源寄托之書冊，全行歸還”。¹這一線索將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與歐洲在華天主教在北京的遺留財產聯繫起來。本文根據俄羅斯中央歷史檔案館藏“關於葡萄牙傳教士遺留在北京的財產”原始檔案，對這一線索做進一步梳理。

* 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教授，世界漢語教育史研究學會秘書長，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理事，國際比較文學協會會員。

1. 燕京開教略，《中國天主教史籍彙編》，輔仁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408頁。

一、北京的俄國東正教使團與歐洲天主教傳教士

俄國自17世紀開始與中國真正直接接觸，對與中國展開貿易充滿嚮往，俄國的外交目的，從一開始就是盡可能地接近這個亞洲鄰邦，並同它劃定比較有利的邊界和建立活躍的貿易關係。²為此，俄國利用其東正教教權聽命於皇權的便利，在1715年俄國以為在華俄俘主持宗教生活為由向北京派駐了東正教使團，其實際意圖也在於中俄的邊界和貿易問題。在東正教使團派出之初，歐洲天主教傳教士已在朝廷主持天文曆算，並深得康熙皇帝器重。對此彼得一世特地要求俄國東正教不要以傳播福音為目的，應與歐洲天主教傳教士友好相處，協調俄中事務，因而俄羅斯東正教駐北京使團的外交功能遠遠地大於其宗教使命。1727年中俄恰克圖條約簽訂使俄羅斯東正教駐北京使團常規化：“在京之俄館，嗣後僅止來京俄人居住。俄請造廟宇，中國辦理俄事大臣等幫助於俄館蓋廟。現在住京喇嘛一人，復議補遣三人，於此廟宇住，俄人照伊規矩，禮佛念經，不得阻止。”³滿清中國與地理相鄰的俄國之間事務繁多，早期交往中天主教傳教士中介翻譯，其中必有諸多不便。因此，俄羅斯東正教傳教士在京雖無天主教傳教士官居高位之隆遇，但穩定駐札，定期輪換，卻是俄清談判確定的原則。至天主教在華傳播難以為繼的19世紀30年代，適逢第十一屆俄羅斯東正教駐北京使團在京（1830-1840年間在京），畢學源生前委托第十一屆東正教使團團長魏若明處理身後財產。

（一）東正教神父魏若明

魏若明原名韋尼阿明·莫拉切維奇（Виниамин Морачевич）⁴，1821年作為第十屆東正教使團的司祭來到北京，在京的10年間（1821

2. 班蒂什·卡緬斯基，《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彙編》，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10頁。

3. 中俄恰克圖界約，《中俄邊界條約集》，商務印書館，1973年，第13頁。

4. 魏若明原為俄國“沃倫主教區神職人員之子，1817年畢業於沃倫神學學校，轉入彼得堡神學院學習，在尚未完成學業的1819年被吸收為俄國東正教使團成員，同年9月14日在亞歷山大涅瓦大修道院進入教職，9月26日成為修士輔祭，9月28日由主教米哈依爾授修士司祭職，1820年在前往中國途中在伊爾庫茨克被授予錦章，抵北京後被任命為團長助手。1829年經沙皇確認擔任第十一屆使團團長，1830年獲聖安娜二級勳章。1831年經清理藩院的推薦（1830年12月20日沙皇令）獲得俄政府獎勵的價值600盧布的鑲鑽修士大司祭十字架和修士大司祭聖服，後又得到多種獎勵。見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составленная по случаю исполнившегося в 1913 году двухсотлетнего юбилея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Издание первое, Пекин, 1916年，第102-103頁。

年至1830年間)大部分時間為使團房舍修建操勞,期間只有1828年和1829年沒有施工,使團的兩處駐地的設施整修,“買地、瞭解中國建築的基本情況,買材料,和包活兒的人打交道”⁵,都落到了魏若明神父身上。另外,作為司祭,魏若明在京為俄俘子弟學校任課8年,逐漸使在京俄俘及其子弟開始來主安息教堂做禮拜,基督徒們來這裏聽福音、彼此交流,甚到有不信東正教的中國人也來東正教教堂。魏若明隨第十屆、第十一屆東正教使團在京共20年,自1825年直到第十一屆東正教使團期滿回國的1840年,他一直擔任清內閣俄文館的俄語教師。“為此他必須到城市的另一端給滿俄學校上課,還必須學習滿語。儘管除了夜間以外,他再沒時間學習漢語書面語,但他在實際生活中很快掌握了漢語口語,這使他得以同中國人接近,結交廣泛”。

“與中國朝廷和要人的親近關係鞏固了使團對談判的進度和調子的影響,豐富了俄國關於中國國家治理方式、邊遠省份統計資料、很難進入的上流社會生活等方面的信息。同時通過這種途徑也使中國人能夠正確地瞭解俄國和其他國家,驅散了對於中國政治和宗教生活的主要偏見。在翻譯中國史籍時積累了統計資料、地理學、法律、習俗、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資料。魏若明神父過去和現在都非常關注中國的農業,他把近百種中國糧食和園藝植物的種子、以及12種農具模型運回了俄國,計劃組織關於中國農業的專門文集”。在第十一屆使團期滿回國後,魏若明得到嘉獎,並被任命為彼得堡亞歷山大一涅瓦修道院院長。1842年魏若明向亞洲司總結自己在華20年的活動時說,回憶在北京度過的歲月,一種無愧於自己的使命的滿足感油然而生。

1830年第十屆東正教使團返回俄國後,魏若明留任為第十一屆使團團長。在第十一屆俄羅斯東正教使團內部,由於魏若明與使團的教士和學生的關係不甚融洽,甚至本應協助使團團長工作的使團管理委員會,也與團長魏若明僵持對立,使團成員向伊爾庫茨克省長告狀、向俄國外交部亞洲司告狀之事時有發生。魏若明看到自己在使團內部毫無威信,便向亞洲司請求解除自己的團長職務。“1835年亞洲司決定把使團的領導職責轉予切斯諾依,韋尼阿明·莫拉切維奇只負責與理藩院的聯繫”。但同時亞洲司強調,“這一決定對外嚴格保密。給中

5. 同上,第106-107頁。

國朝廷的所有公文都應以韋尼阿明神父的名義，韋尼阿明神父在中國朝廷中結交廣泛，很有影響”。⁶魏若明自1821年便來到北京，自1825年秋天起就在俄羅斯文館擔任教習時間（長達15年），與中國人的關係，無論是魏若明使團之前還是之後，從未有哪屆使團獲得這麼高的評價。整個北京城的名流都來使團請求隨團畫家為他們畫像，中國的許多達官顯貴都來向隨團醫生尋診問醫。魏若明實際管理使團的5年間，經他手送給中國人的官配禮品達6000盧布。⁷

（二）在北京的天主教傳教士與俄國東正教傳教士

在中俄的早期交往中，歐洲天主教傳教士以拉丁語為媒介，一度作為溝通中俄的翻譯，1675年俄國第一個外交使團——斯帕法里使團來京時，南懷仁、巴多明等從中協調，俄國便已洞悉了天主教傳教士在滿清朝廷的影響和位置。1689年尼布楚條約談判過程中，徐日升、張誠從中斡旋，也使得俄國進一步瞭解了該如何與北京的天主教傳教士打交道。彼得一世明確指示俄羅斯東正教駐北京使團在京應處理好歐洲天主教的關係，避免出現矛盾。因此，俄國的東正教使團自在京活動之日起，便同歐洲天主教傳教士往來密切。在東正教使團早期，“凡生活在北京的俄國東正教修士大司祭都必須和耶穌會士交往，因為這樣可以瞭解到不少新聞，可以比較方便、確切地打聽到當地的事情”。⁸

天主教傳教士自明末便在中國宮廷任職，東正教傳教士入華後在中國語言、歷史文化學習以及基督教傳播的過程中，較多地採用了天主教傳教士積累下來的相關成果。早在彼得堡科學院成立之初的18世紀30年代，馬若瑟的漢語語法書、漢語詞典已為俄國人所知。⁹1729年到達北京的第二屆東正教使團團長普拉特科夫斯基（Антоний

6.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7, стр. 142. 該書中譯本見《俄羅斯漢學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

7.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составленная по случаю исполнившегося в 1913 году двухсотлетнего юбилея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Издание первое, Пекин, 1916. Стр. 105-106.

8. [俄]尼·伊·維謝洛夫斯基編：《俄國駐北京傳道團史料》，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52-53頁。

9. [捷克]嚴嘉樂著，叢林、李梅譯：《中國來信》，大象出版社，第121-139頁。

Платковский) 曾將耶穌會士編寫的漢語學習資料帶回俄國，這份資料後又交給了1744-1755年在北京的第四屆使團，使團成員抄寫複本並依之與當地居民交談，培養了語言能力。¹⁰1733年俄國駐北京商務代表朗格曾去理藩院請求允許學習漢語和滿語的學生盧卡·沃耶伊科夫把巴多明神父的法漢詞典譯成俄語。¹¹1781-1794年間在北京的第七屆東正教使團隨團學生安東·弗拉德金曾抄錄耶穌會士所編漢拉詞典。¹²在俄國東正教第九屆駐北京使團團長比丘林在俄國大量發表關於中國的論著之前，耶穌會士關於中國的記述是俄國瞭解中國的重要途徑之一，通過天主教傳教士的論著和詞典瞭解中國的語言和歷史文化，也是不少在京東正教傳教士的選擇。他們所留下的漢語拉丁語詞典，也不免借鑒在京天主教傳教士的語言資料，現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檔案館、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圖書館藏有第九屆東正教使團團長比丘林以及第八屆、第十屆使團成員編纂的多種拉丁語漢語詞典，在這些詞典的編纂過程中，天主教傳教士的語言資料定是重要的參考資料。¹³處理畢學源身後財產的魏若明神父本人，就翻譯過法國傳教士編的漢語詞典，用於俄國東正教使團成員的漢語學習。¹⁴

葡萄牙傳教士福文高、李拱宸於1801年入京，畢學源、高守謙於1804年入京。在魏若明入京的1821年，這4名在欽天監任職的葡萄牙傳教士已在北京生活近二十年，魏若明在關於歐洲在京天主教的記述中寫道，“我們東正教使團，六年來與葡萄牙傳教士相互寬慰、他們給我們各種熱心的幫助還記憶猶新……”。¹⁵可以看出，魏若明對葡萄牙傳教士是心存感激的。在畢學源病重之時，魏若明時往探望，或

10. 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閻國棟、肖玉秋譯：《東正教在華兩百年史》，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0頁。

11. 柳若梅：18世紀俄羅斯人關於中國語言的教與學，《跨越東西方的思考》，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年，第378-404頁。

12. 現該抄本保存在梵蒂岡圖書館的Fonds Borgia Chinois (Borgia Cinese)收藏中的第485號，包括約8500個漢字。

13. 柳若梅：俄羅斯漢學家手稿詞典散論，《辭書研究》2010年第4期，第127-138頁。

14.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составленная по случаю исполнившегося в 1913 году двухсотлетнего юбилея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Издание первое, Пекин, 1916. стр.106.

15. Вениамин Морачевич, Записка о европейских Миссиях в Китае, Китайский благовестник, 1911, №8, стр.23.

差僕人前往問訊。畢學源去世後，魏若明把處理畢學源身後事當成是還葡萄牙傳教士的人情，認為是應盡的仁愛之心。¹⁶

二、歐洲天主教的遺留財產與俄羅斯東正教駐北京使團

在魏若明關於在京的歐洲傳教士的記述中可以粗略瞭解到在京天主教傳教士與俄國東正教傳教士之間的關係：

1820年，我們的使團在京之時，北京只有在欽天監供職的4名葡萄牙傳教士，早先在京的4座歐洲天主教堂也只剩下法國傳教士的教堂和葡萄牙傳教士的教堂。前些年最後一名法國傳教士受命出京與一名因偷偷在南方某省傳教而被逮捕的法國教士對質，後遣其由對質地前往廣東，從此法國傳教士教堂便交由一名葡萄牙傳教士住持管理。

1824年，福文高神父的去世使在京葡萄牙傳教士人數又減少了一名。僅有的3名傳教士，儘管處境艱難，但仍寄希望於清廷會允許從葡萄牙再派來新的傳教士，繼續為清廷服務。1826年，管理欽天監的官員徹底拒絕為他們在京傳教提供保護，粉碎了這3名傳教士的希望。於是，在法國教堂作住持的高守謙，為人聰明果斷，他向李拱宸和畢學源說明他們二人的年邁的事實以及一旦去世可能失去所有教產的危險，建議他們儘快處理在京的財產，然後帶著錢款前往澳門，但是葡萄牙教堂的李拱宸對這種比較明智的做法並不認同，於是高守謙決定一人前往歐洲，在得到中國皇帝的准許之前，一直對李拱宸和畢學源隱瞞自己的決定。由於清廷對高守謙處理的歐洲事務十分反感，很快就批准了他返回歐洲的要求，並只給他15天時間準備啓程。這一消息對李拱宸打擊很大，以致於在接到消息的第三天李拱宸便去世了。隻身一人在北京宮廷服務的傳教士——主教畢學源，自己決定作為最後一名傳教士的命運，歐洲人在北京的各種事務讓他感到處處危機四伏。他在向中國皇帝上奏李拱宸去世消息的同時，提出自己已年邁，無力接續完成李拱宸的工作，提出和高守謙一同返歐。

高守謙以給李拱宸辦喪事為由，向朝廷請得延期15天啓程。此時天主教傳教士在京擁有房產和商鋪，每年能帶來約10萬盧布的收益。

16. 同上。

短時間內這些財產難以變賣，兩難之時高守謙想把所有財產兌給俄國東正教使團。俄國東正教使團先向清廷瞭解俄羅斯人是否可以在中國購買不動產，得到肯定回答後便準備從高守謙處接收歐洲傳教士的財產。但高守謙經過和滿清官員協調，將啓程時間又向後拖延了半年。在這半年的時間裏，高守謙變賣了所有不動產。為了在清廷面前兌現原來的話，得到朝廷允許他把在京不動產轉讓給俄羅斯人的權利，他便把墓地旁的菜園和4家鋪子留下兌給俄國東正教使團。¹⁷

在兩人啓程之前約半個月時，在教友的一再懇求之下，畢學源以年邁難以承受長途跋涉為由，向中國朝廷請求留在北京。

變賣了葡萄牙傳教團所有不動產之後，高守謙於1827年3月離開北京，變賣財產所得留下畢學源主教生活和教堂必須的一部分錢款，其餘全部由高守謙帶往澳門，交給澳門的監察院負責者或庇護人。清政府購買法國教堂的5000兩白銀，也由高守謙帶走交給當時也在澳門的法國傳教團住持。藏書豐富的葡萄牙圖書館，大量各式餐具和傢具，在兩位傳教士整理行裝之初好意地留給了我們東正教使團。

畢學源已年老體弱，早在高守謙在京時計劃返歐之初就向李拱宸和畢學源提到過一旦發生意外教產將受到威脅的問題。現在，這個問題再次擺在了孤身一人在京的畢學源面前。

由於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與滿清政府的特殊關係，也由於作為使團團長的魏若明與在京的葡萄牙傳教士之間的良好關係，並考慮到清政府同意的可能性，畢學源指定魏若明為其遺囑的執行人和財產代理人，希望魏若明通過正當的渠道將葡萄牙傳教士的教產轉給其繼任或寄往澳門。

魏若明接受了畢學源請他擔任遺囑執行人的請求，同時向俄國外交部亞洲司報告了此事，接著便在畢學源去世後著手處理葡萄牙傳教士的教產。

17. Вениамин Морачевич, Записка о европейских Миссиях в Китае, Китайский благовестник, 1911, №8, стр. 21-23. 其中記錄的高守謙返歐緣由與樊國梁：《燕京開教略》中的記錄略有出入《燕京開教略》，降生後一千九百零五年歲次乙巳救世堂印，北京主教樊國梁准，《中國天主教史籍彙編》，輔仁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405頁。

需要說明的是，畢學源委托給魏若明的財產，並不是高守謙離京時為畢學源留下的所有財產。1819年，高守謙開始代管北堂法國傳教事務，同時遣使會司鐸中國人薛瑪竇在北堂任上司，兼管修道院。高守謙在回歐洲之前變賣了北堂，薛瑪竇便投奔畢學源寓居南堂。

在畢學源還在世時，就將教堂的錢物委托給薛瑪竇，薛瑪竇在畢學源在世之時就已經將一些教堂財物轉移，畢學源去世後薛瑪竇又變賣了一些財物。¹⁸畢學源去世後，依其遺囑存在票號中的銀票轉到了魏若明的名下，薛瑪竇把葡萄牙教堂的財物也都交到魏若明神父手裏。現錢包括：（一）兩張銀票，共計5800000文；（二）白銀500多兩，黃金約20兩。實物包括：（一）教堂裏的幾間空房子和離教堂不遠的其他建築物；（二）墓地及相關房產和菜園；（三）畢學源的四輪馬車；（四）12個裝教堂聖器的空櫃子；（五）5座白銅枝形燭臺；（六）幾個書架和兩張木椅。

魏若明接手這些財物不久，在安葬畢學源之前，薛神父又把白銀和黃金悉數取走，在向趙主教¹⁹告知畢學源去世的消息時交給他。轉到魏若明名下的兩家票號的銀票，由於票號經營不善，只兌付出1900000文（這樣兩家票號分別欠有2700000文和1200000文）。教堂房產和衣櫃等雜物，變賣時談到價格為27675300文，但最終只拿到23682280文。即魏若明一共拿到錢款25682280文。魏若明用這些錢款購買了白銀4685兩4分（14940764文）、黃金50兩1錢（2411920文），尚餘錢款5187076文。²⁰這些拿到手的現錢，通過薛神父牽綫，全都交給了趙主教，最終該筆款項轉到了澳門。趙主教收到此筆款項後，由北京的中國傳教士作證人，給魏若明寫了一份收款字據²¹，後

18. 俄羅斯國家歷史檔案館檔案：РГИА фонд No.796, опись No.448, ед. хр. No.9, лист No.22。

19. 趙主教（João de França Castro e Moura, 1804-1868），於1825年到達澳門，1829年在菲律賓晉鐸，1830年前往南京教區任署理主教，1833年11月赴北京，出任署理主教。詳見《16-20世紀入華天主教傳教士列傳》，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568頁。

20. 變賣房產時的各項花銷共356520文已經扣除。

21. 俄羅斯國家歷史檔案館檔案：РГИА фонд No.796, опись No.448, ед. хр. No.9, лист No.24 об.

來來葡萄牙傳教士在澳門的皇家庇護人也給魏若明寫來一封關於收到些筆款項的信函。²²

現在，魏若明手中尚有的葡萄牙教產只是那些需要與中國政府交涉或者需要與京的商人交涉的：（一）變賣房產時的賒帳和兩家銀號的欠款；（二）未能變賣的教堂用具；（三）葡萄牙傳教士墓地的幾間房子和菜園；（四）還有高守謙畢學源準備離京返歐時送給俄國東正教使團的圖書和銀餐具。

如何處理這些財物，在俄羅斯東正教使團內部產生了意見分歧，並將此事捅到了俄國外交部亞洲司。

三、俄國東正教使團對葡萄牙傳教士遺留財產的處理

在高守謙計劃返回歐洲的1826年，是魏若明作為第十屆俄國東正教使團司祭在京生活的第六年。在第十屆東正教使團中，團長“修士大司祭彼得全身心地奉獻於使團事務，作為一名教士，他的生活堪稱楷模，是一位值得稱道的牧人，待人接物很有分寸，也是一位勤奮的學者。在他來說最關心的事是與中國官員保持良好的關係，很多中國官員都是他的朋友。蒙藏活佛經常光顧他這裏，一些喇嘛和僧人也是一樣。使團在中國的權勢顯貴中廣交朋友。使團的內部秩序方面修士大司祭彼得從數量極少的阿爾巴津人教徒入手整頓。這些阿爾巴津人已經被嚴重漢化，對東正教態度漠然。修士大司祭彼得用簡潔、充滿感情的話傳教，說服阿爾巴津人放棄異教的墮落習俗，全身心地熱愛自己原本的東正教，虔敬地面對聖像。他經常溫和地鼓勵他們，造訪他們家裏，特別友善慈祥。修士司祭韋尼阿明也像彼得這樣做。他住在北館，在俄羅斯佐領那邊，即聖母安息教堂附近，阿爾巴津人已經開始來這個教堂了。他和他們交談，並做到用中文向他們傳播上帝的福音”²³……“在履行聖命時，修士大司祭彼得用官方經費在中國為

22. 俄羅斯國家歷史檔案館檔案：РГИА фонд No.796, опись No.448, ед. хр. No.9, лист No.35 об.

23.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составленная по случаю исполнившегося в 1913 году двухсотлетнего юбилея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Издание первое, Пекин, 1916. стр.97.

外交部亞洲司圖書館選擇購買最有用的書看成一項重要職責，他預想到羅馬教的傳播在中國很快要受到壓制，以後一本書也沒處買，他就不惜錢財想方設法盡可能多地收集由歐洲語言譯成漢語、滿語和蒙語的基督教書籍”。²⁴高守謙和畢學源啓程前處理教產時，墓地旁的菜園和4家鋪子兌給了修士大司祭彼得為團長的第十屆使團。高守謙獨自一人離京時，葡萄牙傳教士圖書館藏書、餐具、傢具也是送給了這一屆使團。畢學源1838年去世，在京的是第十一屆俄國東正教使團，魏若明在自己的第十屆使團司祭期滿後，留任為第十一屆使團團長。在第十一屆俄羅斯東正教使團內部，由於魏若明與使團的教士和學生的關係不甚融洽，甚至本應協助使團團長工作的使團管理委員會，也與團長魏若明僵持對立，使團成員向伊爾庫茨克省長告狀、向俄國外交部亞洲司告狀之事時有發生。魏若明看到自己在使團內部毫無威信，便向亞洲司請求解除自己的團長職務。“1835年亞洲司決定把使團的領導職責轉予切斯諾依，韋尼阿明·莫拉切維奇只負責與理藩院的聯繫”。但同時亞洲司強調，“這一決定對外嚴格保密。給中國朝廷的所有公文都應以韋尼阿明神父的名義，韋尼阿明神父在中國朝廷中結交廣泛，很有影響”。²⁵無論是魏若明使團之前還是之後，從未有哪屆使團獲得這麼高的評價。整個北京城的名流都來使團請求隨團畫家為他們畫像，中國的許多達官顯貴都來向隨團醫生尋診問醫。魏若明實際管理使團的5年間，經他手送給中國人的官配禮品達6000盧布。²⁶但是，在第十一屆使團中，魏若明與使團成員不和，“反對派的核心就是切斯諾依”。在使團管理權轉給切斯諾依之後，他“也並沒有放鬆對韋尼阿明神父的監視。在葡萄牙傳教士事件上就體現出這一點”。²⁷

畢學源病重時，魏若明有時前去探望。畢學源去世後，魏若明認為按應該的方式為畢學源籌辦葬禮是自己應盡的義務，並盡最大努力

24. 同上，第106頁。

25.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7, стр. 142. 該書中譯本見《俄羅斯漢學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05-106頁。

26.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составленная по случаю исполнившегося в 1913 году двухсотлетнего юбилея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Издание первое, Пекин, 1916. Стр. 105-106.

27. 同上。

完成作為畢學源遺囑指定財產代理人的職責。但是在俄國東正教使團內部，握有管理實權的切斯諾依擔心魏若明親葡萄牙傳教士的做法會使禁教、驅逐天主教傳教士的清政府以同樣的態度對待俄國東正教使團。因此，切斯諾依向俄國外交部亞洲司報告此事，認為魏若明在沒收到外交部指令的情況下，就擅自決定著手處理葡萄牙教會的教產，是很不明智的。

俄國外交部亞洲司在給魏若明報告的回復中說，魏若明未經亞洲司批復，擅自決定處理葡萄牙傳教士的財產，是不正確的。這件事本與俄國、與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無關，在清政府驅教、禁教的政策之下，魏若明的做法，有可能會給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招致像在華天主教一樣的災禍。本來畢學源在遺囑請魏若明將財產轉給他的祖國即葡萄牙，但魏卻轉給了生活在中國的葡萄牙傳教士。“亞洲司清楚地知道，與秘密生活在中國的歐洲傳教士的一切往來都是被禁止的，希望和要求您不要再有類似之舉，不要與該人就葡萄牙財產的事擅自往來”。²⁸要求魏若明和駐北京俄國東正教使團，將“盡可能地保持謹慎，不要因自己的行為引起中國政府的絲毫不滿和懷疑”²⁹作為處理葡萄牙傳教士遺留財產的確定不移的原則。亞洲司認為，葡萄牙傳教士遺留財產一事關係到駐北京俄國東正教使團的命運，細小的粗心都有可能帶來不利的後果。因此，要求魏若明向切斯諾依和使團管理委員會彙報相關做法，取得一致認可的前提下才可付諸實施。並具體指示魏若明：

（一）葡萄牙傳教士留下的所有財產，包括不動產和動產，屬於已故主教畢學源一切，都應詳細登記在冊，並附有相關證明材料；

（二）變賣葡萄牙傳教士財產的所有款項，都應該入使團帳內保存，以便入將來政府支配，或者近期您和使團委員會根據本規章共同商議；

28. 俄羅斯國家歷史檔案館檔案：РГИА фонд No.796, опись No. 448, ед. хр. No. 9, лист No. 6。

29. 俄羅斯國家歷史檔案館檔案：РГИА фонд 796, опись 448, ед. хр. 9, лист No. 5-6。

(三) 同時還應該上交詳細說明材料，以什麼價格賣給了誰，附上所有相關材料、字據等，以及所有財產的清單；

(四) 過變賣或其他方式擁有的款項都應保存在使團的賬內；

(五) 這筆款項在使團中單獨立賬，記在單獨的賬簿上；³⁰

同時亞洲司還告訴切斯諾依，亞洲司處地遙遠，信息不暢，不能夠提出正確有效處理方案，要求切斯諾依和使團委員會認真瞭解考察，最終決定做何種限度的處理，但必須遵守兩條原則，以確保俄國的聲譽，避免使俄國使團招致災禍：

(一) 不可引起中國政府的絲毫不悅，不可損害我們的尊嚴。這是您和使團委員會在以後所有的判斷和處理上必須堅持的最主要的原則。

(二) 注意避免日後引起財產的法定繼承人的不滿。³¹

經使團上報俄國外交部亞洲司，最後決定這樣處理這些財物：

1、變賣其中的房產，所得款項暫時放在俄國東正教使團不動用，將來找機會交給葡萄牙政府；2、和中國商人交涉，追回票號的欠款；3、像一般處理教堂舊物那樣，燒掉教堂聖器；4、墓地和菜園收歸俄國東正教使團，以菜園收入維持墓地整修和管理；5、銀餐具保存在東正教教堂。6、相關事宜做好記錄，在東正教使團輪換時將完整記錄交由新一屆使團。³²

第十二屆俄國東正教使團（在京）由修士大司祭波利卡爾普（Поликарп Тугаринов）主持，據《中國的東正教使團歷史》一書載，1848年，葡萄牙傳教士藏書中的天文學書籍轉入俄國東正教使團，隨團學生戈什科維奇為葡萄牙傳教士藏書編寫了目錄。³³1860

30. 俄羅斯國家歷史檔案館檔案：РГИА фонд 796, опись 448, ед. хр. 9, лист No.2-3。

31. 俄羅斯國家歷史檔案館檔案：РГИА фонд 796, опись 448, ед. хр. 9, лист No.4。

32. 俄羅斯國家歷史檔案館檔案：РГИА фонд 796, опись 448, ед. хр. 9, лист No.33-34。

33.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составленная по случаю исполнившегося в 1913 году двухсотлетнего юбилея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Издание первое, Пекин, 1916. Стр. 119-121.

年，俄國東正教使團將葡萄牙傳教士藏書和天主教墓地歸還給了天主教在京主教孟振生。³⁴

由此，歐洲傳教士19世紀在華遺留財產與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之間的這樁要事算是劃上了句號。天主教史家認為，“俄人於法國教務傾覆之際，乃能敦尚邦交，慨然相助，全行歸還，宜法國修士佩德弗忘也”。³⁵俄國東正教使團的後人認為，“魏若明負責任地處理葡萄牙傳教士留下的財產，為俄羅斯人在中國人和歐洲人中贏得了名譽和尊敬”。³⁶

34. 同上，第138頁。另外，《北堂書史略》（惠澤霖原著，李國慶譯注，載Catalogue of the Pei-T'ang Library, Peking Lazarist Mission Press, 1949，之附錄《北京圖書館圖書館西文善本目錄》附錄部分，第32頁。

35. 燕京開教略，《中國天主教史籍彙編》，輔仁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408頁。

36.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составленная по случаю исполнившегося в 1913 году двухсотлетнего юбилея е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Издание первое, Пекин, 1916. Стр. 107.

